

## 民国时期岭南中医医德思想演变探析

文洁贤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 1912年至1949年之民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和思想大发展的时期, 岭南名医为适应社会变革形势发展了中医医德思想。在医患间利益关系上, 岭南名医不再固守“正其义不谋其利”的思想, 提出医者有其合理利益诉求; 在医者间关系上, 既重视相互合作, 也强调相互竞争和批判; 在医业与政府关系上, 不再受“犯上非仁”观念束缚, 与政府废止中医的行径抗争。岭南名医顺应时代发展、革新中医医德的思想和实践, 对建构新时代中医药话语权、增强文化自信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岭南名医; 民国时期; 中医医德;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 R-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3213(2021)01-0192-04

**DOI:** 10.13359/j.cnki.gzxbtcm.2021.01.034

## Analysis on Evolution of Medical Ethics in Lingnan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N Jie-Xian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of 1912 to 1949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n era when great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took place. To adapt to the social changes, celebrated practitioners in Lingnan area developed the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ethics. When discussing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patients, the practitioners in Lingnan area no longer stick to the idea of “pursue the right without seeking profit” and raised the idea that practitioners had their reasonable interest demands;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practitioners, they emphasized that competition and criticism were as important as close cooperation; for manag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overnment with medical industry, the practitioners were no longer confined by the idea of superiors and started to fight against the abolition of TCM by the government. The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reforming medical ethics for TCM by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practitione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CM and enhanc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oday.

**Keywords:** famous practitioners in Lingnan area; the Republic of China; medical eth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1912年至1949年之民国时期乃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之社会大变革和人际关系大调整时期, 也是人们思想观念日新月异的大发展时期。在此期间, 关乎生命重大问题之医患关系、医界同行关系、医界与外界的关系也随之出现调整。在此环境中的中医学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新型人际关系, 并随之调整、改进中医道德规范, 以适应时代变迁对中医发展的需求。岭南地区是近

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思潮涌动的重要阵地, 岭南中医名家也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和医界大调整的实践活动, 并对中医医德的发展和进步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和探索, 现探析如下。

### 1 民国时期岭南名医在处理医患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变革

从周朝重视礼制建设开始, 中国一直非常重

收稿日期: 2020-03-13

作者简介: 文洁贤(1970-), 女, 硕士, 副教授; E-mail: wen9805@gzucm.edu.cn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度资助项目(编号: GD18CXY02); 广东省教改资助项目(编号: A1-2606-19-129-001); 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2019年度项目(编号: 2019GZGJ94)

视伦理道德生活及其发展。特别自汉代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并以较高道德标准来调整和规范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在此社会文化背景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古代中医学者，秉持仁心仁术的理念和医者需德性崇高的观念，也就顺理成章了。

自古从医者首先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就是医生与患者的关系，特别要处理医患之间的利益关系。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儒家思想家为生活中的人们确立了处理义与利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sup>[142]</sup>；孟子则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sup>[12]</sup>。在孔子重义轻利、孟子君子耻于言利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指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sup>[3]</sup>

在以上主流义利观的熏陶下，中国古代著名中医家大都秉持不为名利、只为仁义的道德准则，处理医家与病家的关系。如孙思邈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sup>[4]</sup>。且古代医家历来有为贫病患者赠医奉药的传统。“贫穷之家及游食僧道……，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sup>[5]</sup>。

民国时期岭南名医继续坚守“重义轻利”的理念治病救人。但在时代变迁、竞争剧烈的大潮流中，中医家如果仍然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耻于言名和利，甚至强调“君子安贫知命”，则难以面对和解决近代以来中医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诸多问题与危机。特别是在首开商埠的岭南地区，中医医馆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中医与西医间的竞争也日渐凸显。“据记载，1932年这里(广州西关)有20余家医馆，……抗战胜利后，他们当中不少人陆续回市，并群集转移到和平路开业。这时，中医馆已多达30多间”<sup>[6]</sup>。在此新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下，中医名家要生存和发展，其思想观念必然要有所继承和发展。

**1.1 民国岭南中医名家对待病家依然坚持重义轻利的医德传统** 民国岭南中医名家几乎同时亦为儒医，在当时社会动荡、民众常受贫病困扰的

年代，他们继续怀抱以医济世助贫的社会责任感和重义轻利的传统医德情操。如陈伯坛、黎庇留、易巨荪、谭星缘、梁翰芬、彭泽民、罗元恺、黄耀燊等民国名医传记中几乎都有扶贫济困的医德事迹。陈伯坛以“医德高尚，行医以‘富者多取而不伤，贫者减免而受惠’为宗旨，以‘精、警、整、醒’四字为准则，治病收效神速，远近闻名”<sup>[7]</sup>；黎庇留“以儒通医，……故生平淡泊名利，以济世活人为职志”<sup>[8]</sup>；易巨荪为十全堂医局主席，“与黎庇留、谭星缘一起主持医务，义诊不收诊金”<sup>[9]</sup>；“我祖父(梁翰芬)不但医术精，而且医德好，人很敦厚、平和，对病人有爱心。有时候病人比较穷，他不要钱，还给病人钱”<sup>[9]</sup>；彭泽民则“凡贫苦患者均义务诊治，对革命同志更是照顾资助，有求必应”<sup>[10][196]</sup>；“罗元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对患者和蔼可亲，有求必应，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有农妇到他家找他看病，不但给病人看病，还招待其病人家人食宿”<sup>[11][151-152]</sup>；“黄氏(黄耀燊)医术高明且医德高尚，同行评曰：‘黄耀燊，婆心济世，着手皆春，且素重义轻财，恤贫救苦，可谓擅岐黄之术且具菩萨之心者。’”<sup>[12]</sup>

《近代西关岭南名医》<sup>[6]</sup>一书记载的45位在民国时期行医的名医中，有24位名医的传记中提及其赠医施药、济世助贫的事迹，其他人物小传中未提及恤贫救苦事迹的名医，并非这些医家无此等事迹，而是篇幅所限，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迹需记，故略过。民国名医深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怀仁心、施仁术已经成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道德习惯。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儒家文化教育)要求他们应该这样做人，他们从小跟随的师傅教导他们如此行医，其内心深处对贫病者的不忍、恻隐之心已成为日常行为习惯。正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13]</sup>

**1.2 民国时期岭南中医名家在处理医患关系方面之医德创新** 民国时期，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市场竞争的环境日趋明显，身处商业前沿的岭南中医医师不免受生存竞争压力之迫。这势必促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发生改变：行医不仅是救世济民施仁德的职业行为，也是适应并参与生存竞争的市场行为。故此民国时期名医处理医患间利益关系时，不再一味强调“君子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同时开始提出合理的利益诉求。如陈伯坛提出“富者多取而不伤，贫者减免而受惠”<sup>[7]</sup>的行医宗

旨。以上中医名师行医宗旨和态度已隐含着医师从事悬壶济世这份事业的同时也当谋求合理物质利益。

民国时期岭南医家不再把自己执业中的利益诉求遮掩起来,而是大方地面对和承认医师执业应取得合理利益的观念,这是近代岭南名医看待医患关系观念的创新。

## 2 民国时期岭南中医在处理医业同行关系方面的思想变革

### 2.1 民国时期岭南名医之间团结合作、发展中医

中国自古有“以和为贵”、谦虚谨慎等与人相处的美德和习惯。孔子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sup>[195]</sup>。其学生有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sup>[198]</sup>。因而中国古代医者在处理同行关系时,也主张医者之间要和谐相处、谦虚谨慎。“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sup>[19]</sup>;“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如此自无谤怨,信和为贵也。”<sup>[5]</sup>

民国时期岭南名医持守“和为贵”的优良传统,合作共商治病救人,留下了许多守望相助、共谋中医发展的佳话。如,易巨荪与好友黎庇留、谭星缘倾力合作,共抗甲午鼠疫,提出了升麻鳖甲散验方。易巨荪记载道:“庇楼(留)以孝生员兼大国手,精伤寒金匱,为吾粤诸医之冠,厥后善悟,之二君者,与予为心性之交,每于灯残人静、酒酣耳熟之际畅谈灵素论略之理,意思层出,足以补前贤所未逮。吾粤医风最陋,挽狂澜于既倒,作砥柱中流,于二子有厚望焉”<sup>[14]11-12</sup>。易巨荪好友程裕初也提及道:“又甲午大疫,人皆谓黎庇留用升麻鳖甲汤存活甚众,阅读此书则知此方系易巨川所手订,系与黎谭二公商定”<sup>[14]21</sup>。又如黎佩兰写书宣传、推广罗芝园的抗鼠疫验方,“孝廉黎詠咳先生悯此浩动,曾将《汇编》(罗氏之书)悉心研究,……乃撮其症要,并施治诸法,分列层次,兼附医案,使人易晓易从,其用心良苦矣”<sup>[15]</sup>。林庆铨、区德林写作《时疫辨》时亦精诚合作,此书由林庆铨编写、区德林参订。林庆铨在《时疫辨》序中记载其书刊出过程:“吴晓舟太守刊于岭南,传之于人,多验。……幸得子静(区

德林)先生逐条参订,加以眉笈先生治疫之道,最为精详。”<sup>[16]</sup>

近代以来尤其至民国时期,中医不仅要面对西学东渐的碰撞,甚至面临被行政废止的危机。值此严峻考验,中医名家们直面现实,精诚合作,救亡图存,为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执守恤贫慰疾的仁心仁术。

### 2.2 民国时期岭南名医对中医庸医道德低下状况的批判

民国时期,社会混乱、时风日下,医界道德每况愈下。社会上对中医医德批评声音不绝于耳。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批评中医庸医:“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处方,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sup>[18]</sup>;“即今之悬壶问世者,惟以一得之技术自眩,而毫无道德观念,动辄以索取金钱为目的,利欲熏其心,日习与机械险诈,以售其获取金钱手段者,比比然也。所谓见人之病,如己之病,不以贫富而歧视,不以病难而厌恶,不以病轻而疏忽,抱完全救世宗旨,治疗重任者,实不多观。”<sup>[19]</sup>

在此状况下,岭南名医们深刻认识到:为中医图存发展、永续发展计,无人可以置身事外,必须勇敢站出来批判时下庸医医德低劣、医风败坏之现象,重塑中医医风高尚的形象,增强中医在医德上的竞争实力。这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医医德处理同行关系的思想发展为既要和、也要争。卢觉愚批判时医(庸医)败坏中医医德的现象道:市医中“更有狡黠者,凭敏慧之机智,圆滑之手腕,周旋缙绅,结纳豪贵,以增益声价,操纵权术,揣摩心理,以迎合病家,肆江湖之滑调,用平淡之药方,病者信之服之,无咎无虞,旅进旅退,一诊再诊,以至十诊百诊。病愈归功于医,不治委诸天命。一人然,众人然,而医之囊橐丰盈,名利俱收矣。……是故中医之流品杂,如此,非加整理,将何以图存?优胜劣败,为天演公例”<sup>[10]232-233</sup>。罗元恺对一味追逐名利、有损中医名声的下医亦深恶痛绝。他说:“医之下者,以浅薄之技谋取名利,巧言令色,欺世盗名,败坏中医的名声,应当受到谴责。”<sup>[11]69</sup>

民国时期岭南名医在处理同行医者间的关系上,既重视相互合作,也强调相互竞争与批判,更认识到勇于接受批评、敢于接受竞争是医者乃至整个行业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关键。

### 3 民国时期岭南名医在处理医业与政府关系方面的思想变革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是在古代等级社会环境中而形成,故古代儒家思想对于平民对朝廷的反抗和斗争(犯上作乱)普遍持批评和反对态度。“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sup>[11]</sup>古代中医如何处理医业与朝廷的关系虽无专人专文论述,但在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与儒家同样秉承“犯上非仁”的立身处世之本也就可想而知。然而在民国时期废止中医的浪潮中,在民国政府试图通过行政条例废止中医的情势下,中医已然面临生死存亡之危机,中医师们再不反抗、斗争,几千年中医成果将被毁于“反中医潮流”中。是以中医师们联合起来对抗此股反中医潮流,团结起来与民国政府废止中医的行径作斗争。

中医素有为贫病者赠医奉药的医德传统,但国民政府(包括广东地方政府)禁止中医界人士参与馈医施药的活动,以达废止中医的目的。李仲守、黄焯南、卢乃潼等号召医业同仁团结起来,以各种形式的行动,对抗废止中医逆流。“李氏(李仲守)挺身而出,毅然在《医药学报》上撰文,痛斥国民政府的反动政策,并致电全国,号召中医药界同仁行动起来,‘一致力争,毋任国医国药再受于政治铁蹄之下’”<sup>[6]50-51</sup>。黄焯南为新会《国医月刊》所撰发刊词云:业医者应尽匹夫之责,“联络医界以交换知识,而融贯中西;维持药业以去伪存真,而慎重民命。编纂医药月刊以广见闻,及赠医施药以惠穷黎,设院留医以周无告,开办学校以培养后学,建设药物馆、图书馆,以启迪寒士”<sup>[10]226</sup>。由是,甘伊周、连可觉、区少章、宋展岐、梁端齐、梁具天等名医坚持在方便医院等慈善医疗机构赠医奉药、惠及穷黎,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医师的医者仁心、救民济世之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邓铁涛在《中医名家医书合集大系》中记载、评述了中医界的抗争:民国时期“我国医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学论争中,……引致废止中医的思潮此起彼伏,不断地摧残、侵蚀着有几千年优良传统的中医学的根基。……甚至公然企图以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医学人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从联谊请愿到宣

传呼吁,从著书弘道到撰文辩驳,从办医刊建学到函授课徒,这些中医学界的领跑者,好像一面面旗帜,砥柱中流,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申诉和抗争难以计数”<sup>[20]</sup>。在直面西学东渐的时代挑战中,古老而年轻的中医也获得了医德医术的新生。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岭南名医既继承和发扬中医传统优良品德,又适应时代要求推动中医医德的近代化。当然也要看到中医医德在当时发展的时代局限性。如未形成系统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医学伦理学思想体系;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医者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并未理顺;与同行间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尚未规范化等。民国时期岭南名医发展中医医德的思想 and 实践,对今天回应时代关切、建构新时代中医药话语权、增强文化自信具有启发意义。

#### 参考文献:

- [1] 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 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2.
- [3] 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4.
- [4]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3.
- [5] 陈实功.外科正宗(裘钦豪点校)[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337.
- [6] 卢集森.近代西关岭南名医[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4.
- [7] 刘小斌,郑洪.岭南医学史[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2:201.
- [8] 黎庇留经方医案(评述版)[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
- [9] 梁颂名.岭南中医世家[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6.
- [10] 吴粤昌.岭南医征略[M].广州:广州市卫生局,1984.
- [11] 张镜源.中华中医昆仑(第7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
- [12] 吴粤昌.广州中医药大学校史资料汇编[M].广州中医药大学,1996:224.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 [14] 易巨荪.集思医案[M].橘香书楼藏手抄本,1894.
- [15] 黎佩兰.时症良方释疑(影印本)[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5-6.
- [16] 林庆铨.时疫辨(影印本)[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9-10.
- [18] 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
- [19] 朱培章.医生与道德[J].医药评论,1929,1(8):6.
- [20] 中医名家医书合集大系[M].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2010:2.

【责任编辑:贺小英】